

新書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二期（2021年春季）：384-393

DOI：10.6752/JCS.202104_(32).0014

重探群眾路線與社會主義經驗：為兩岸關係思考 Revisiting the Mass Line and Socialist Experience: Thinking for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王智明*

Chih-Ming WANG

首先謝謝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組織這場論壇，尤其謝謝劉紀蕙老師和賀照田老師的邀請。很久沒和林淑芬老師同臺，尤其感到開心。

賀老師有新作發表，我當然非常為之高興，但老實說，我並不是評論這本新書最適當的人選。一方面我自己的研究範疇並不是中國當代史和思想史；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許多經驗，對於在臺灣成長、受教育的我來說，還是有些隔膜。也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賀老師的著作很值得臺灣讀者參考，尤其是在兩岸關係緊繃的當前，我們實在需要對中國大陸過去70年的發展與經驗，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賀老師過去20年的知識工作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提供了我們許多深刻且有用的參照。因此，我今天的報告除介紹我對這本書及賀老師工作的理解外；有一個部份也是希望將他書中討論的幾個議題放到兩岸關係的脈絡中來理解和思考。至於問答環節中的討論我則會在文末略作回應。

我對賀照田老師的最初印象，是翻閱《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這本書得來的。老實說，當時覺得這本書很不好進入，很多地方也看不

投稿日期：2021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2月17日。

*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副教授，以及《文化研究》主編。

聯絡方式：wchimin@sinica.edu.tw。

懂。2006年我甫博士畢業，對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的知識狀況僅是一知半解。國民黨教育下的文革中國印象仍然很深刻。雖然知道改革開放，但主要是透過臺灣的大陸旅遊節目、在美國與大陸朋友的交談，以及親人赴陸探親、旅遊的經驗而來，自身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潮和社會變遷所知極為有限，是以「知識感覺和觀念感覺」這兩個詞雖然可以透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覺結構」匯通，但仍然無法確切掌握中國現實中的種種思想論爭（例如1993-1995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等），更遑論對當代中國的知識工作有任何的理解。後來認識了賀照田老師，並在2013年參加「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後，我們才有了更多書本之外的認識與交往，對賀老師與大陸的思想狀況才多了一點「感覺」。因此，這個報告也側面反映了我這幾年在讀書會裡的學習成果，也藉此機會感謝在讀書會上認識的諸多朋友。

1967年賀老師在黑龍江出生和成長，1985年到北京讀書，先考進了北大的力學系，隔年再轉入中文系立志研究詩學，在校園裡很是活躍。¹三年後「八九六四」發生，他也因為「八九六四」之後不能直接讀研究所等懲罰性規定，到了一家專業報紙工作。1993年重回北大中文系讀碩士時，興趣轉向中國思想學術史的研究；1996年起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職。從本科時期參與編輯《北大學生報》、研究生之際擔任《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主編開始，他參與許多刊物的編輯，並積極參與推動了多種的學術活動。近十餘年又輾轉各地（臺中、臺南、新竹、臺北、東京、上海、杭州、重慶、香港、廣州等地）講學、訪學。《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就是2018年他在交大訪學的成果之一。同時，他參與亞際書院的各項工作，包括組織每年的「金澤會議」和「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

賀老師的經歷在一定意義上有菁英取向，但他不論寫作或私下行動，一直關懷「人民大眾」的存在與感受；也對主流的論述（不論是右派或是新左派）和歷史敘述抱持警醒，這點尤其展現在他對「群眾路線」以及對「潘曉問題」的關注上，也就是《革命—後革命》一書中最關鍵的兩個

1 見賀老師2004年在豆瓣上的自述：<https://www.douban.com/group/55120/>。

章節。這也就使得賀老師的知識工作，大體落在「當代史」與「精神史」兩個軸線上，向政治史延伸並在社會史裡反思，彼此相輔相成。甚至可以說，他是從精神史的角度貫穿對當代史的理解，展開他對政治史的反思；同時他又把當代的問題理解為精神的問題，在社會史的視野中汲取經驗，回頭形成自身對當代史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在〈朝向深處的旅行〉這篇文章裡，賀老師（2019: 422）對自己的學術路徑有如下表述：

在我精神史、社會史交互為用解讀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文獻的努力中，當我以精神史把握、思考為目標時，可說社會史處身的位置是工具性的輔助位置。但當我的目標不設定為精神史而設定為社會史時，這種精神史、社會史交互為用解讀文獻的努力，就是一種由精神史切入社會史的方法。

而如此努力的終極目標，是爲了對政治史中的「一些時刻」有所回應。因爲正是這些逸離常軌、有賴非常手段予以回應的時刻，足以突顯「政治」與「現實」的關係，可以讓我們看見政治與人心的謀動，亦即政治與社會的發展如何仰賴特定的歷史、文化、精神與觀念機制才得以運轉。這大概是他在2006年這本大作中對「感覺」一詞反覆強調的原因，後續再又演變爲「歷史—社會—文化—觀念機制」之類的表述方式。

歸根結底，賀老師一再追問的，是如何進入歷史、感知歷史，把握歷史的問題，但他又是用一種近乎「赤手空拳」的方式在應對歷史敘述中種種的語言與意識型態的陷阱，藉以從歷史中提煉出「經驗」——既要讓「經驗」不輕易地化約爲歷史，成爲一種可以對應主流或官方歷史的側面或底層；又要使之成爲一種面對「現實」的方法論，不讓現實過快地壓倒、淹沒了「經驗」的複雜性，乃至經驗本身的他者性。在這個意義上，賀老師的知識工作與文化研究有許多呼應，但他不是從西方理論出發，或以之爲絕對的對話對象；而總是立根於、回歸於「當下」——不論是當下的歷史或是歷史的當下——試圖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經驗的解釋，乃至面向未來的指引。不論是「潘曉」、「雷鋒」，還是「歡歡」，賀老師念茲在茲的是，這些具體的案例如何揭示歷史的轉折，以及與之應承的文化、觀念與精神機制如何變化。

因此，我主要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革命—後革命》這本大作，亦即

賀老師所說的「病藥相發」其實是理解當前中國症兆的一個方法論；既要細思「病在何處」，又得思考「用藥過猛」，乃至是「吃錯藥」的傷害。因為崛起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既來自於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過激之處，也源於改革開放後對歷史反思的不足與路線調整的過當。對賀老師來說，社會主義不是病，改革開放也沒有錯；出問題的地方恰恰是我們對病的診斷出了錯，對藥的使用有誤失。這兩者大致可以歸結到「啓蒙—反啓蒙」和「革命—反革命」這樣的一組雙重變奏中。因為這一組歷史敘事的方式恰恰不是辨證的，而是內涵著某種進化論史觀，對歷史的態度不是批判的揚棄，而是全盤的否定。這種否定式的史觀正是對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有所經驗和理解的賀老師所不能接受的。如書中所述，不能接受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對於「理想主義」的拋棄和遺忘，二是對於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理解不足。前者造成了崛起中國的自大，以及改革開放後人心與社會倫理的無以安頓；後者使得社會主義的「民主」關懷與制度被棄若敝屣，社會治理愈發高壓而專擅。這後半部正是此書第二部分的重點所在，也是為什麼賀老師屢屢以「感覺」、「精神」、「身心」與「苦惱」等字詞展開分析的緣由。因為問題恰恰源於「啓蒙—反啓蒙」、「革命—反革命」這樣簡單的歷史否定運動。僅僅是單純的「反對」，即「撥亂反正」式的反對，並無法正面表列我們現在要追求的價值，因為那更是對過往理想的否定。反對啓蒙，中國社會就真的不再需要啓蒙了嗎？否定革命，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基礎該放在哪裡？又如何面對自身的歷史以及世界對中國的理解？這樣的歷史與自我否定將給當代中國人帶來什麼樣的困擾、如何影響他們的身心安頓與主體塑造？在中國崛起勢頭下的中國人主體與身心，又將對世界帶來怎麼樣的影響？我認為這些問題正是賀老師大作的核心關懷。

不過，這些問題賀老師在〈作者小引〉以及〈啓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中已有很豐富的討論，我就不再展開。底下的討論，我更想要聚焦在「群眾路線」與「社會主義」這兩個關鍵詞上（主要討論梁漱溟和群眾路線這兩章），並將之放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中去思考。當然，在當下的「覺青臺灣」這麼做，是很有風險的，因為這兩個詞恰恰是臺灣對中國惡感根深蒂固的來源之一。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直視社會主義實踐的

意義，並且重新面對「群眾」的問題。如果我們希望兩岸能夠維持和平的交往，臺灣就有必要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歷史有所理解，更必須打破意識型態的刻板偏見去深入對方的歷史經驗與現實關懷，即賀老師所說的「苦惱」。因為中國的苦惱未必不是臺灣的苦惱，中國人的感覺也值得臺灣人理解和尊重。唯有如此，兩岸才有機會打開民族主義的封閉迴圈，不再以一種零和的敵我關係想像未來。誠然，這是兩岸關係最為難解的關節，但這也是當代兩岸知識分子無可迴避的挑戰與責任。

社會主義的問題貫穿了賀老師大作的第一部份，尤其與「群眾路線」的討論緊密連繫在一起。借道梁漱溟先生對中共建國看法的變化，賀老師突出了一個很具深意的視角，亦即如何看待階級鬥爭與中共建國的問題。賀老師指出，以鄉村建設工作聞名的梁漱溟原先並不看好中共，但在參觀了中共接管後的工廠、特別是下鄉參與了土改等經驗當中，他感受到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巨大差異，恰恰反映在民心向背上。這個民心向背的差別不只是認同哪個政權的問題，而是1949革命成功後「廣泛出現的人心感奮狀況」（賀照田2020: 80），以及這個狀況之於建國穩定所扮演的核心作用。這使得梁漱溟進一步去思考階級鬥爭與建國的問題。

梁漱溟發現，現代中國建國之難在於武力主體的缺乏與分散，阻礙了中國統一的進程。而武力主體之所以缺乏和分散是因為社會精英與普羅大眾的「精神心理、行為習慣、價值所安」，與布爾什維克政黨以及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不是中國人不渴求民主，而是因為民主的設置和要求，與中國人固有之精神未能相符，是故現代中國的建國道路也就不能照搬西方或俄國的經驗。相較而言中共的成功，起碼在梁漱溟和賀老師的眼裡，並不是因為它是比國民黨更接近布爾什維克政黨的精神，也不是因為它對民主的理解與西方相同；而是因為它充分掌握與調動了傳統中國固有的社會結構和思維感覺，即知識分子深入鄉村和工廠，貼近農民、工人的問題與感受，從而在克服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將農民組織起來。階級鬥爭的意義使不僅在於一個階級打倒了另一個階級，而還在於處於社會底層的階級（農民）能否透過革命的過程——包括人心的喚醒與社會重新組織的方式——被轉化為國家的政治主體，形成堅固的土壤，予以革命精英及其理

想堅定的支持。這一過程，與其說仰賴了土改之類的資源重新分配，還不如說是一個社會改造的經驗，將人民大眾對國家原先零碎分歧的感受和理解，重新鍛造為一個新的集體意識。

換言之，借著梁漱溟的變化與觀察，賀老師要說的是，共和國的成立以及中共革命的勝利，是有群眾基礎、有民心向背做鋪墊的。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在革命中國最成功的時候，從「階級」出發走向「人民群眾」感覺生成的過程中，政黨有效承擔著引導與服務的角色。1949年中國復歸一統，不是因為八路軍、解放軍特能打、裝備好，而是和這個新民心意向的生成直接相關。

儘管這個觀點不免帶著後見之明，但它突顯了「群眾路線」在中共建政史上乃是極為關鍵的行動綱領，而不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對於「群眾路線」，賀老師（2020: 105）以鄧小平的「八大」（1956年）講話為基準，歸納了三個要點：一，群眾路線是黨組織工作和黨章中的根本問題；二，它意味著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三，黨的領導工作成敗與否，取決於是否採取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這三點至關重要，因為群眾路線既是對共產黨的定性（以群眾為指歸的政黨，其作用是為人民服務，是故與黨章和黨組織相關），也是一種工作方法，亦即政策的制定與施行必須依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但尤其關鍵的，是傳統讀書人和士大夫「革命化」後所扮演的角色。在與李南周的對談中，賀老師是如此表述的：

中國革命的群眾路線是以精英的存在為前提的，而這種精英在中國並不現成，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的階級觀念意識推動與先鋒隊政黨意識要求下，由中國士傳統轉化來的。（*ibid.*: 362）

換句話說，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共集中群眾智慧，以對現實課題與解決問題的實踐有更準確、全面、穩妥認識的方法，拉近中共精英和群眾情感、習慣的方法，也是把階級意識觀念所直接引出的認識相對化的方法」（*ibid.*: 363）——如此，中共得以了解群眾，而不致於被階級所設定的理想化推定所誤導，而得以回歸社會中的「人」（不僅僅是個人，也是社會）的具體現實處境。

也因此，這與臺灣社會熟習的「以民意為依歸」的民主想像不完全相同。因為群眾路線並不是放任原子化的個人全權做主，而是在社會的語境中理解個人和群體的需要。它要求的不是表面上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彷彿民意是絕對而不變的，而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反覆調整和實踐。這麼一個反覆的過程基本上反映了一種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想像：這個「民主」不是齊頭式平等的一人一票，而是對「人民需要」的把握與尊重。誠然，制度的施行少不了政治的損耗，很難確保人民的——特別是個人的——需要一定能夠如實照辦，一如「民之所欲」可能只是「藏在我心」。但是方法和想法是在的，關鍵在於操作和制度上是否真把群眾當一回事。賀老師對於「八大」講話、「八大」黨章、〈葉講話〉和「十二大」黨章等文本的分析，恰恰是為了說明「群眾路線」在經歷文革看起來把「群眾」放到最高，實則用激進的「群眾運動」取代了「群眾路線」；以及改革開放的「撥亂反正」後，如何從中共的制度和工作方法中滑落、佚失，徒留其名，痛失其質。

因此，重新肯認「群眾路線」這份遺產，一如梁漱溟對階級鬥爭的肯定，就成為針砭改革開放後，中國崛起現實的一帖良藥。因為「群眾路線」的遺落與改革開放後對文革的否定相關，更與知識與政治精英對於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敘述相關，也就是與如何看待「群眾」與「革命」的問題緊密連繫著。值得強調的是，「群眾路線」不只是理解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方式，在某個意義上，它可能更是一種理解社會與國家關係的線索，亦即人民主權的想像如何落實，如何維繫、調整、或是轉化社會與國家的互動和應對。

「撥亂反正」意義下的改革開放，對之前革命的過度激進，進行調整本來是必要的。但由於其中發生了對「群眾」這一革命和政治主體的否定，當然就使得共產黨一直強調的「為人民服務」的立黨精神不容易落到實處、乃至變質。換句話說，藉由提出「群眾路線」在現代中國的浮沉這一線索，賀老師要批判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後，一定程度地背離了民心、逸離、甚或否定自我曾經有過的創意實踐。更進一步說，這也意味著當前的批判工作不能只是藉著流行的理論進行批評的展演；而要具體而微，實事求是地去指認與思考，怎麼做才是真正把人民的福祉作為施政

的指歸，同時以「群眾路線」為方法，重新提煉「民主」的真意，重新鍛造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一如階級，不只是一份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更是一種面對現實的理論與思想工作。

重新提出現代中國如何建國的「文化」問題（梁漱溟的關懷）與「群眾路線」，不僅對中國大陸有現實而立即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在我看來，對臺灣和兩岸關係的思考也極為重要。一方面，臺灣現在正經歷著漫長的建國歷程（不論我們視之為自1947年以來的「臺獨建國」或是視之為1911年以來的「自由中國」），建國的文化或是說價值問題，一直至關重要但討論有限，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該怎麼形成、如何發展，亦少見著墨。（當然，我們不是沒有關於福利國家或法治國家之類的願景，也常可看見對自由和民權的標舉和主張；但是國家的「價值」何在，如何落實「民之所欲」、如何協調社會上多元的認同與權利需求，不論在法治層面或是文化層面似乎仍未有充分的討論。）如果說，臺灣已然不同於中國，需要建立一個符合現實的新社會與新國家；那麼我們必須要問的是，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的文化與政治主體是誰？這個新興社會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該如何確保人民主權，又該如何面對自身的「革命」或「轉型」歷史？如果說建國的成功無可避免地牽涉到社會與人民主體的改造，那我們的歷史與法制能否接納和容忍那些拒絕改造的「遺民」？臺灣能否避免走上文革那樣激烈而暴力的道路？同樣的，誰才是這個新興社會與國家中的「人民群眾」呢？他們的想法、感覺和心情能否被充分反映，成為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核心考慮？如果民粹式的民族主義成為兩岸共同的「主流民意」，那麼我們的政黨與社會精英是該「順應民意」還是「逆勢操作」呢？如何思考「民心向背」又能夠不陷入民族主義式的「火車相撞」？怎麼樣的發展與選擇，才能避免兩岸陷入戰爭呢？我想，這些都是賀老師的大作給我們帶出的重要課題。賀老師字裡行間憂心重重，苦惱至深；走筆至此，或許我們也該有所同理，進而勇於共同承擔吧。

最後，提出兩個延伸性的問題，供賀老師進一步發揮：一，如何面對西方民主政體對社會主義「民主」遺產的質疑，特別是當「群眾路線」已然於中共體制中存而不論的時候？群眾路線如何能重新開啓關於民主的

討論，回應中國與西方體制上的差異？中國的民主必然得與西方的民主不同嗎？二，從中國革命所展開的社會與人民主體重構的角度出發，再考慮中國深入世界後所造成的種種衝突，尤其在當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語境下，作為「中國人」似乎已成為一個沉重的包袱。回顧共和國走過的革命道路以及中國人民從革命而後革命的歷史經驗，您覺得，當前作為「中國人」的意義與責任何在？面對香港和臺灣日漸高漲的獨立意識與民主追求，您又會如何思考「重作中國人」（或是「不作中國人」）這樣的命題呢？

在問答的討論中，劉紀蕙老師提出了兩個議題：如何不以國籍來定義與思考人的存在，以及如何考慮人和社會的關係？由於這個議題部分與我的發言相關，所以我也略為記述我的想法。

一、不以國籍來思考人的存在，是我願意支持的方向。一方面因為這樣的想法帶有烏托邦的面向，著重於肯定「人」的普世性大於特定的歷史、文化或政治標籤；另一方面是因為國籍的思考，是民族國家體系下的特定產物。因此我們更需要歷史化地看待我們對於國籍或國家的欲望。但同時，我也想指出，起碼在當下這個歷史時空，國家並不只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或純粹是一種情感的建構，它同時具有物質性的基礎。而這個物質性基礎的發展，會關涉到在特定處境中的人的狀態。移民和難民是典型的例子。他們是有條件、或被迫移動的人群，具有去國籍存在的潛力，但他們總是受制於國籍或國家的邊界，乃至受其迫害、或因其犧牲。是故，雖然去國籍的烏托邦面向值得珍惜，我們仍須務實地面對國籍和國家的黏著，如何對移動的個人和群體產生制約。

二、關於「人與社會」的關係，我更想從社會與國家或人民與國家的這個角度來理解，藉其張力，提出一個分析的框架。比方說，大陸有所謂「國退民進」或是「國進民退」的說法，來表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社會與國家不總是處於一個統合無縫的狀態，而是一個互動與協商的歷史過程，而這個過程模塑著國家與社會的樣態。因此，以之為分析，我們可以化約地說，中共建政的經驗是國家掌握乃至內化了社會

的過程。而改革開放則是有條件地，在特定領域釋放社會力量的嘗試。這大概是類似1970年張俊宏、許信良等人在〈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中對社會力解放的思考。那麼，臺灣在解嚴之後，隨著社會力的解放，是否慢慢走入了一個社會要重新打造和模塑國家的過程（亦即張、許等人分析所要尋找和指認的革命力量）呢？如果我們可以這麼看的話，那麼人與社會的問題，其實總有一個國家的介面存在。與其將之視為臺灣的特殊歷史處境，或許我們更應該注意民族國家體系所施加的影響，使得任何地方的社群或社會，總是無意識地在趨近或抗拒國家，或是尋求其保護；或是以攫取國家（政權）的方式鞏固自身，或是消極抵抗著國家的壓迫，以逸離的方式保全自己（例如原住民）。這些不同對應國家（或是說國家對社會的滲透）的方式，也就使得人與社會的關係不容易有機地展開。我們既回不去傳統社會中的社區支持結構，另類的跨域社會想像和實踐也就更為困難。換言之，弱化國家管制、開放社會似乎是恢復社會力量的必要道路，但在這個重視國家再分配功能，反映主體性的時代裡，這似乎也是最為違逆潮流的一種思路。因此，「群眾何在」、「人民何欲」的問題，就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因為我們最終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人民／社會如何能夠改變國家，使之更好、更符合期符？

引用書目

- 賀照田（He Zhao-Tian）。2020。《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 *Geming hougeming: zhongguo jueqi de lishi, sixiang, wenhua shengsi* [Revolution/Post-revolution: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China's Rise]。新竹（Hsinchu）：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 。2019。〈朝向深處的旅行（後記）〉“Chaoxiang shen chu de lyuxing houji” [Travel to the Depths]，收錄在氏著《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Renwen zhishi sixiang zaichufa: shifou biyao? Rube keneng* [Re-Initiating the Humanities: Necessities and Possibilities]，頁383-433。臺北（Taipei）：唐山出版社（Ton San Books）。